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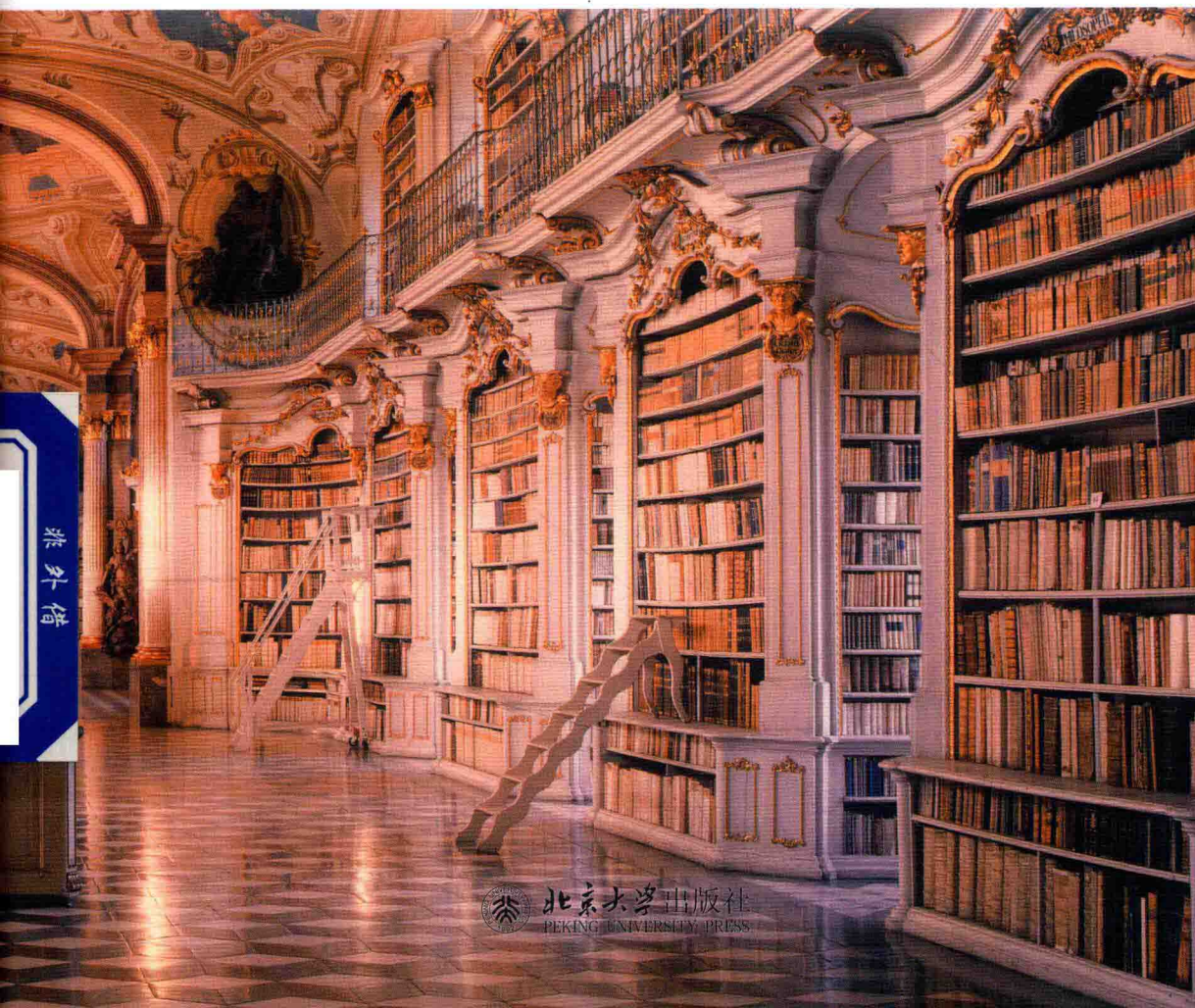
大 / 学 / 之 / 道



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

教育的终结
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美] 安东尼·T. 克龙曼 著
诸惠芳 译



非外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

教育的终结

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美] 安东尼·T. 克龙曼 著
诸惠芳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51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美)安东尼·T.克龙曼著;诸惠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0

(大学之道)

ISBN 978-7-301-29866-4

I. ①教… II. ①安… ②诸…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研究—美国
IV. 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2678号

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7 by Anthony T. Kronman.

书 名 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JIAOYU DE ZHONGJIE——DAXUE HEYI FANGQI LE DUI
RENSHENG YIYI DE ZHUIQIU

著作责任者 [美]安东尼·T.克龙曼 著 诸惠芳 译

丛书策划 周雁翎

丛书主持 周志刚 张亚如

责任编辑 刘 军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866-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l@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67346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4.5印张 220千字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8.00元(精装版)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大学之道 —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母亲罗塞拉

六岁的我问她：“星星的上面是什么？”
她说：“好一个玄妙的问题。”
她的语调清楚地告诉了我，
这一类问题有多么重要。

才智的愉悦显然既不如感官的愉悦那样生动,也不如情感的愉悦那样摄人心魄,因此,在青年时代,我们更强烈地追求的是即时的精彩,与之相比较,对知识的追求似乎足可以被忽略,被漠视。学习和知识带来的快乐虽然不是最强烈的,但却是最经久的,这种快乐最不受外界事物的左右,最不被机缘所戏弄,也不被时间所磨蚀。稳健的男人存钱是为满足年老时的生活做准备,所以他也需要为老年进行智力储备。随着星移斗转,相对价值发生转换——索福克勒斯说,时间带走了曾经的欢乐,使之更近似于痛苦。一个强壮的人到了弯腰驼背之时,欲望就将熄灭,届时更关心的事情是一个人是否还能说“我的心智是我的王国”,灵魂之窗是朝向宽阔的、赏心悦目的景色,还是面对的只是一堵砖墙。

——A. E. 豪斯曼,1892

教育是什么?我假定教育是一个人为了追赶自己而不得不经历的全部的课程,而没有通过课程的人,即使其生活在最文明时代的事实对他也无济于事。

——瑟伦·克尔恺郭尔,1843

致 谢



我要感谢我的同事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保罗·卡恩(Paul Kahn),他们对本书的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感谢我的朋友贾斯廷·扎伦拜(Justin Zaremby)的帮助。还要感谢耶鲁法学院2008级的贾斯廷·舒鲍(Justin Shubow)和2006级的杰米·戴卡斯(Jamie Dycus),他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帮助;感谢我的助手玛杰·卡梅拉(Marge Camera)给予我的热情洋溢且称职的帮助。我衷心地感谢耶鲁法学院为我提供了支持性环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才得以对本书所讨论的有关问题产生自己的见解。我的朋友和经纪人温迪·斯特罗斯曼(Wendy Strothman)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指导;耶鲁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乔纳森·布伦特(Jonathan Brent)是一位出色的对话者和善于激励人的批评者。像往常一样,我最受惠于我的妻子南希·格林伯格(Nancy Greenberg),没有她的鼓励,无论是这本书还是我生活中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

序 言



1965 年秋,我第二次成为威廉姆斯学院的二年级学生。一年前我离开了威廉姆斯学院,成为争取民主社会学生同盟(SDS)的组织者。这是学院中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南方的黑人学生活跃在民权运动的最前线。他们的勇气为世人树立了令人赞叹的榜样。在北方,争取民主社会学生同盟的学生领袖(大部分是白人)开始了他们自己的争取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运动。1962 年的《休伦港宣言》*就是他们的宣言。它动情地、明确地阐明了美国的理念与种族主义的以及贫穷的现实之间的堑壕,号召我们这一代学生(我们是当代人,在至少是小康的环境中长大,目前住在大学校园里,正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去填平这个壕沟。^① 越南战争刚刚开始。美国学院和大学的校园中开始涌动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未曾见过的能量。到 60 年代末,这些鼓动人心的力量发展成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学生运动。

作为当时的大学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这一运动的一员。我们感到我们在书写历史。我们深信我们正在参与比我们个人的生活

* 1962 年,美国积极投身民权运动与和平运动的大学生们创建了争取民主社会学生同盟。该同盟代表当时被称为新左派的力量。在密歇根州休伦港举行的成立大会上,该同盟正式通过了由密歇根大学研究生汤姆·海登起草的一篇宣言。《休伦港宣言》对美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批评,涉及种族歧视、核战争危险、不是为了和平而发展原子能、冷战、财富分配不公、大学生的政治冷漠以及自由主义思想的枯竭,等等。——译者注

① Tom Hayden, *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The Visionary Call of the 1960s Revolution*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2005).

壮阔得多的事件。这是令人振奋的思想,使我们其余的生活尤其是学校生活相形见绌。像我的其他同代人一样,我全身心地接受了这一思想并且像某些人那样按照这一思想行动起来了。在取得了父母的勉强同意后,我在1964年的感恩节离开了威廉姆斯学院,一个月后我就与其他四位组织者一起居住在芝加哥北部的白人贫民区的一所小公寓内,希冀能帮助发起我们所谓的“不同种族的穷人运动”。

我的父母是具有自由主义信念的民主党人。他们在1948年投票支持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并两次投艾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的赞成票。他们痛恨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尊敬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我吸收了他们的信仰并把这种信仰带到了学院。但是在威廉姆斯学院我接触到了一种能考验我的信念的新思想。民权运动的学生领袖们用自己的榜样证明了仅有对公正和平等的信念是不够的。他们表明了为了争得公正和平等,人们还必须进行斗争并作出牺牲。他们证实了必须投身于斗争,必须成为生活大辩论的一名辩手,或者不惜任何代价地去冒险。这是一种令人畏惧的思想,但又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思想,因为它暗示了一个人一旦举起了旗帜并大步前进,他的生命终将有可能变得重要。1964年秋我19岁。在这之前我的全部生活是在学校里面度过的。我在想,什么是更重要的——继续在学校里度过几年,所有的一切都导致我所能看到的结果;或者行动起来,为我看得非常清楚的事业服务?确切地说,我如何才能用这些我至今仍未搞明白的词来设计我的选择。我说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渴望能鼓动我作出这种选择。但是当我在第一次上大学二年级期间离开威廉姆斯学院时,是因为我最终确信了我的人生意义处于危机中,并且确信,如果我留在学校中,我则将继续自己正在走着的老路,而这意味着我在冒过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的风险。

在芝加哥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整天不断的门铃声和分发传单,夜以继日地开会评估成绩和制订计划。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周边居民的联盟,动员他们去对自己的房东和这座城市施加改革的压

力——争取更干净的住宅、更安全的街道，最终争取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命运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个聚居区被称为“住宅区”，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当地的居民大部分是来自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的过去的采煤工人，在矿山资源枯竭后他们来到芝加哥寻找工作。长期的经验使他们懂得工会的重要性。他们很有礼貌，但是对那些巧舌如簧的年轻人满腹狐疑，这些年轻人敲开他们家的门，试图说服他们相信街坊同盟是与工人的工会相同的组织，以及拒付房租与煤矿罢工毫无二致。

七个月之后，我们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只有一次流产的拒付房租和在市议员办公室外的人行道上的一次抗议活动（在这次抗议活动中，我和我的那些组织者伙伴的人数超过了那些抗议者），我开始怀疑我今后三十年从事组织工作的生涯是否会产生那种能证明我一生的努力是值得的结果。我的政见没有改变，我羡慕那些在住宅区定居的组织者。我仍能感受到同样的冲动，驱使我去过有目标和有价值的生活。我想要的生活是否就是我正在过的生活，对此我已不太自信了。对于什么是我想要的，我也不太有把握了。我去芝加哥寻找关于人生意问题的答案，是因为我确信在学校中绝不可能找到对此问题的答案。七个月之后，问题依然还是问题，但是政治行动主义的生活不再被看作是对此问题的明确答案。我开始怀念曾被抛弃的生活。

威廉姆斯学院是一个惬意的场所，它是我所怀念的一部分。然而我还怀念阅读（我现在几乎没有时间阅读）和学院生活中的神聊，而所有这一切是我的组织者工作的严酷现实所不允许的。还有来自我父母的温和的压力，他们即使已为我支付了全年的学费，但还是接受了我离校的决定（作为一个自己的孩子也在学院上学的父亲，我现在认识到这种牺牲是父母给予的礼物）。我的父母从不说“回学校去吧”，但是当我在那年夏季回到洛杉矶的家中并对他们说我想回到威廉姆斯时，他们由衷地如释重负。但我并不比一年前更清楚学校将把我引向何方。对于学校能为人生的意义做点什么我也没有更充足的信心。世界的要求看来还是那么大、那么紧迫，与我当年离开威廉姆斯学院去迎合这些要求时并无二致。那是1965年的夏季，在我的父母和我

讨论秋季返回威廉姆斯学院的计划时,我们看着电视中播放的二十英里之外的或另一个国家发生的暴动。但我已做好了返回学校和回归我曾经放弃的生活的准备,并尽我所能地把东西整理归类好。

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在那年秋季注册了后来成为威廉姆斯学院哲学系讲座教授的纳撒尼尔·劳伦斯(Nathaniel Lawrence)所教的讲习班。我上了一年级学生的哲学导论课程并想深入学习这门学科。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我能在哲学中以及在劳伦斯教授的讲座中找到对那些折磨我的问题的答案。讲习班的名称叫“存在主义”。其他大部分学生都是三、四年级的学生,我感到他们略胜我一筹。那些阅读文献都很难啃。我们阅读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的《非此即彼》(*Either/Or*)、萨特(Sartre)的《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和伟大的天主教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的《存在的玄妙》(*The Mystery of Being*)。我们每周在劳伦斯教授的家中聚一次,他的家离校园只有几个街区。每次授课时间为三个小时,中间有一次吃茶点的休息时间,点心总是很新鲜(承蒙劳伦斯夫人的美意)。秋天来临了,白天变得越来越短,空气也变得越来越冷。巴克夏*披上了猩红色和金黄色。当我们下午到达劳伦斯教授的家时,看到炉火熊熊,他的两条金黄色的爱犬正在熟睡,就像火炉边的书靠那样。

每次讨论都是鼓舞人心的,并且常常是热烈的,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好像利益攸关似的——就像对关于存在主义的讲习班所能期待的那样。讲习班的核心是关于如何生活得最好、应该关心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以及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克尔恺郭尔、萨特和马塞尔都以不同的方式涉及了这个问题,而我们围坐在劳伦斯教授家的壁炉旁困惑地、矛盾百出地、热切地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到了这学期的第三或第四周时我已经开始越来越激动地期盼我们的会谈。在那个秋季,讲习班成为我在课内外所做的每一件事的中心。这部分地是因为这些阅读文献很深奥并能开启心智,部分地是因为我发现我能赶上我的高年级同学并且能做出些许贡献,还部分地是因为劳伦斯教授的智慧

* 巴克夏为地名。——译者注

和仁厚包容了我们所有的人。但是最主要的是因为我在那个班上发现了我自己的自此以来的核心信念。我发现人生的意义是一个可以在学校中研究的主题。

在学院或大学中有许多东西可以研究。什么构成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生命的问题,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可以在其他不同的场所去寻找答案。还有许多其他的机构(宗教场所是最显要的),包括许多与正规教育没有什么关系的其他环境能提供有关人生意义的教诲,在这些环境中人们有许多发现,从而促使他们说“我的生活具有我认识到的和珍爱的价值”。40年前我在劳伦斯教授的讲习班中所发现的东西就是,高等教育机构是可以有一种有组织的方式探索人为什么而活这一问题的场所之一。我离开威廉姆斯学院是为了寻找我原本以为比学校更能使这个问题具有现实性的场所。而当我回来时,发现这里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场所。从此以后这里就成了我的职业之家。

过去的40年中我依次是学生、教师和院长。当了10年院长之后我现在又是一位教师。在过去的28年中我一直是耶鲁法学院教授会的一员。现在我正执教耶鲁学院一年级新生课程,这门课程研究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基础的哲学、历史、文学和政治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尽管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这么多年来我最深信不疑的信念始终未变,这个信念就是:学院或者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它还是通过仔细地、批判性地阅读从古人那里继承来的文学、哲学等伟大著作去探索人生奥秘和意义的论坛。多年来我的许多信念发生了变化,但唯独这个信念未变。我坚信人生的意义是可教的,自从劳伦斯教授首先帮助我产生了这个信念之后它从未动摇过,我的全部职业生涯都在为这一信念辩护并把它传授给我的学生。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因为我看到人生意义这个问题失去了它作为一门有组织的学术教学科目的身份,它被推到了人文学科的专业尊严的边缘。然而曾几何时,它在其中占据着核心的、尊贵的地位。我自己对此信念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而产生了个人的失落感,我感到我能说的仅仅是这是一个能够也是必须要在我们的学校中教授的

问题。在我担任教师和院长的年代,我把人生意义问题看作是从人文学科中游离出来的,最初认为这是现代研究理念威望日益增长的结果,后来则认为这是政治正确性文化的结果——正是这种文化削弱了该问题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以及人文学科教师追问这一问题的权威性。在我看来是那么显而易见和重要的价值却被轻易地弃置一旁,对此我感到迷惑不解和气愤。在考察这种演变时我转而怀疑它们的原因和结果以及补救的可能性。

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为什么从我们的学院和大学的应该以审慎的、训练有素的方式加以研究的问题目录中消失了?对研究理念的诉求其根源何在?为什么这一诉求如此敌视该问题?多样性思想和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关于价值完全是权力的表现的信念,为什么对探究人生目标和意义的问题的努力具有如此的侵蚀性?当我们的教会现在正垄断着探讨这一问题的权威地位时该问题从学院和大学中消失了,这一般会对文化产生什么后果?复兴它在学术机构中的尊贵地位的前景又将如何?

这些问题正是我在本书中所要问的和回答的。我作为很早以前就爱上了人文学科的威廉姆斯学院的学生提出这些问题。我又作为一个力图把人生意义问题在自己的课堂上保持鲜活的法学和哲学教师来回答这些问题。我还作为曾经的院长提出这些问题,有关研究理念和政治正确性的精神诉求让这位院长整日焦虑,它们把人文学科置于防御地位,人文学科引导我们探究人生意义的权威性也受到了怀疑。

这个问题对我个人而言是极为迫切的。我力图回答这些问题是为了捍卫我在生活中所关心的和所做的事情。但是,这个问题对另外一些人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就是人文学科教师,他们需要恢复曾经拥有的对其引导探索人生目标和价值问题的答案的威望所持的信心,他们原先是被这个问题本身所吸引而从事自己的工作,他们现在需要重新与这个问题建立起联系。这个问题对那些依赖其教师给予价值引导的学生也很重要,这个问题让他们兴奋、困惑,也可能让他们害



怕,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发现宗教提供的对此问题的答案是不完全的。这个问题对学生的家长也很重要,尽管他们关于现实生活有自己的各种告诫性的忠告,但他们都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孩子获得的教育能超越纯职业的范畴,使他们做好迎接比日后的职业生涯更大的挑战的准备。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所有这些人——教师、学生和家
长,他们处于迷惑和愤怒之中,但他们也满怀信心地希望,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将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恢复自己的正当地位。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人为什么而活?	1
第二章 世俗人文主义	24
第三章 研究理念	67
第四章 政治正确性	102
第五章 科学时代的精神	154
附录 耶鲁大学指导性研究计划 读物目录(2005—2006)	196
术语对照表	200

